



何建明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一个人的 国家 记忆

一个为两弹一星而隐姓埋名18的大院士；一个为共和国诞生而背了30余年黑锅的老地主；一个饱含五代中国伟人心血而崛起的直辖市；一个因选美而荣耀的浪漫城市；一个与共和国盛大庆典同时诞生的工业圣城；一个为百姓创幸福而60年不倒的农民伟人……



国防大学 2 126 5469 8

一个人的 国家 记忆

何建明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126 5469 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人的国家记忆 / 何建明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9

ISBN 978 - 7 - 5302 - 1007 - 9

I. —… II. 何…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2220 号

一个人的国家记忆

YIGEREN DE GUOJIA JIYI

何建明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址：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700 × 990 16 开本 28.5 印张 521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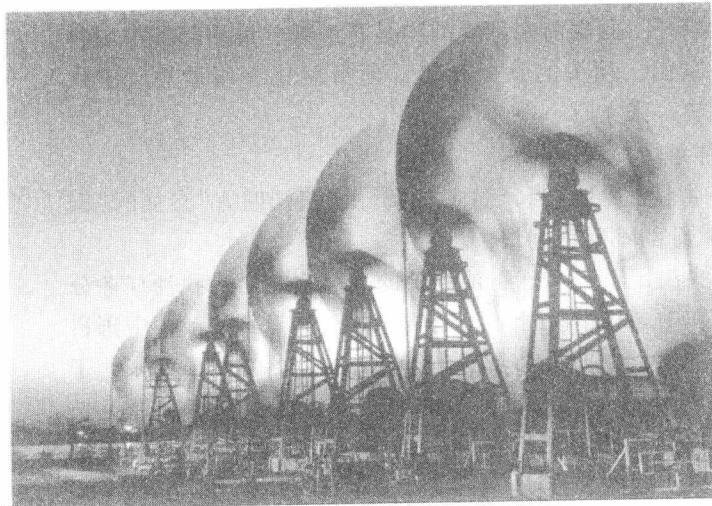
ISBN 978 - 7 - 5302 - 1007 - 9

I · 979 定价：3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目 录

1	第一篇	一个与共和国盛大庆典同时诞生的工业圣城
51	第二篇	一个因选美而荣耀的浪漫城市
89	第三篇	一个饱含五代中国伟人心血而崛起的直辖市
119	第四篇	一个为两弹一星而隐姓埋名 18 年的大院士
195	第五篇	一个为共和国诞生而背了 30 余年黑锅的老地主
225	第六篇	一个为百姓创幸福而 60 年不倒的农民伟人
277	第七篇	一场影响和改变 9 亿农民命运的山村革命
327	第八篇	一场与瘟疫殊死搏杀的城市保卫战
363	第九篇	一段悲痛欲绝的大地震记忆



第一篇

一个与共和国盛大庆典同时诞生的工业圣城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年份，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天安门举行隆重的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与之同时，一个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的中国城市正在中国北方的那片广阔的土地上诞生。它就是今天的石油圣城——大庆。

大庆的诞生充满了传奇和神秘——

1959年农历大年初四，北京街头虽仍冰雪寒意，但市民们欢度春节的气氛仍然浓浓，来往拜年的人川流不息，喜庆的鞭炮接连不断。

这一天早晨，一行人叩开了老将军、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何长工的家门。邻居们注意到，几天来，一群又一群的人给老将军拜年，总是待上几分钟，就得让给新一批的拜访者。而今天拜年的却叫人蹊跷：一阵兴高采烈的拜年声过后，就再也没有人出来，且老将军家的门也给紧紧关闭了……

多年后，这一秘密被揭开：此次前来拜年的均是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的部长、副部长和专家们。领头的是余秋里，他身后还有康世恩、旷伏兆、孟继声、顾功叙、沈晨、张文昭……

这是事先招呼好的“拜年会”。

这是老将军何长工非常得意由他“当家做主”的，由“三国四方”参加的“国家会议”，而且属于想开就开的不定期会议。

需要作些解释。自中央决定重点实现石油自给的战略决策后，找油任务分别搁在了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身上。地质部成立早于石油部，中国科学院又集中了一批顶级科学家，中央要求合三支队伍之力，尽快找出油来，于是“三国”就这么形成，它们分别是以地质见长的地质部、以勘探打出油见长的石油部和以科学技术研究见长的中国科学院。所谓“四方”是指石油开发的四个主要环节：普查、物探、勘探、科研。

“三国四方”的“国家会议”再次在何长工家召开，这意味着中国石油工业战线正在揭开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战役。

指挥这场战役的两个“司令”便是石油部的余秋里和地质部的何长工。与何长工相比，余秋里属于开国元勋中的“小字辈”。何长工资格太老了，余秋里那会儿在江西吉安老家当赤卫队员时，他何长工已经是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军政要员、政委和红军军长了。那时林彪也还在何长工手下当小营长呢！关键是，何长工老将军有过特殊的历史功勋：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时，他是牵线人。何长工功比天大，他因此有资格几十年中能当众叫毛泽东“老毛”，这是所有中共高级干部中独一无二的。

余秋里敬重这样的前辈。而何长工自打当了地质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后，

在石油工业建设问题上，对余秋里也是十分赞赏。年轻人嘛，干劲大，勇气冲。何长工不止一次当面夸奖余秋里，并说：找油问题上，你秋里怎么让我这个老头子协助，我就怎么跟你转！

从踏进老将军的家门那一刻，余秋里的脸上就挂满了喜色。

“老将军，我和康世恩他们几个向您老拜年。祝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余秋里只有一只胳膊，不能作揖，只能敬礼。

何长工笑呵呵地拉过余秋里等人往客厅里走：“你们都是我的‘国家会议’成员，别客套了。坐坐，往里坐。”与余秋里等人在一起，是老将军最得意的事，因为他又可以主持这海阔天空的“国家会议”——国家的事在家里开，这就是何长工的“发明”。

“老伴，快上茶，我们的‘国家会议’就要开始了！”老将军往里屋喊了一声。

余秋里从老将军夫人尹清平大姐手中接过茶杯之时，何长工已经向他发起攻势：“秋里啊，你上任第一年，就给石油部摘了‘黑牌’，祝贺你啊！”

余秋里脸一红：“老将军，你是夸我还是骂我呀？”

何长工认真地说：“‘一五’期间，就你们石油部没完成任务，去年你们不是第一次完成了国家原油任务吗？”

康世恩插话：“才勉强多了几十吨，我们是使了吃奶的力气的呀！”

何长工笑：“这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又问余秋里，“哎，听说你们在四川那边不太顺利？”

余秋里摇摇头：“别提了，我们被狡猾的‘敌人’耍了！”

何长工听后显出一副慈祥而又有几分狡黠的眼神看着余秋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放缓语气对余秋里说：“秋里啊，你们在毛主席面前的牛可是已经吹出去了，今年再不打出油来，他老人家可要打你的屁股了呀！”

余秋里一听，“噌”地从木椅上站起，毫不含糊地回敬道：“我说老将军，你的牛可吹得也不比我们小啊！你当着主席和全体中央委员的面说，‘我们可以找到中国的巴库’！”

何长工一听，两眼发直，盯着比自己年轻许多的余秋里。余秋里呢，也不示弱地将目光直盯老将军。

突然间，俩人叉腰仰天大笑。一边坐着的康世恩、旷伏兆等跟着笑得彼此捶拳。因为在场的人都知道石油部和地质部两部领导在中央“吹牛”的秘闻——

我们上面提到的在余秋里上任地质部不久，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冶金部的王鹤寿放了“今年我们全国的钢产量坚决达到 850 万

吨！争取 7 年赶上英国，第 8 年最多 10 年赶上美国”的话后，余秋里让李人俊上台“打擂”，放出了石油部要跟冶金部“一吨钢一吨油”的打擂口号。石油部是新成立的小部，石油部竟然有如此气魄，当时坐在台下的何长工浑身冒冷汗。

突然间，主席台上通过麦克风传来一个声音：“下面由地质部代表何长工发言。”

怎么回事？正在思忖的何长工茫然地抬起头，发觉四周的人都睁大眼睛看着他。他再往主席台上一看，原来是主持人周总理正在向他示意：“何长工同志，请上主席台来！”噢，轮到我了！何长工赶忙站起来，他那双本来就有点跛的腿此刻比平时更跛了。

场上发出了轻轻的窃笑——那是友善的笑声。

“长工，你有什么卫星可放？”

老将军刚刚走到麦克风前还没来得及镇定一下情绪，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不紧不慢地响了起来。是“老毛”哇！他何长工对这个声音太熟悉了：从 1918 年在长辛店第一次见面算起，他跟“老毛”也认识有 40 多年了吧！

“报告主席：卫星我不敢放，但我代表地质部几十万职工可以在这里向主席和全体代表报告一个喜讯……”何长工毕竟是快 60 岁的老将军了，他不能像前面发言的几个年轻部长那样冲动，但音量仍然不小。

“好嘛，说说你的喜讯。”毛泽东今天特别高兴。

“是这样。”何长工把秘书准备的稿子搁在一边，顺着“老毛”和整个会场的气氛说道，“经过我们地质工作者几年艰苦奋斗努力，我们已经对全国的‘地下敌人’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抓到了‘敌人’的一批‘团长’、‘师长’，而且还抓到了好几个‘军长’、‘司令’！”

这样的比喻，很对台上台下大多数军人的口味，于是何长工在获得一阵热烈掌声后继续说：“我们没有石油，国家就强大不起来。找不到石油是我们的耻辱！找不到石油我们得通通滚蛋！”何长工说完此话，回头朝主席台看看。他看到毛泽东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有炯炯的目光盯着他何长工。

“是的，过去洋人都说我们中国‘贫油’。”何长工继续说，“到底贫不贫呢？我们的科学家不相信，我们的广大职工不相信。毛主席也不相信！”老将军突然把嗓门提高，“在我国的东南西北邻境都有石油，难道唯独我们伟大的中华大地就没有石油？这岂不怪哉？我们不信这一点！绝对不信！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地向大家透露：我们中国不仅能够有油田，而且能找到大油田！找到中国的巴库！”

“好，为长工他们能找到中国的‘巴库’鼓掌！”毛泽东这一声好说得很响，

而且带头鼓掌。于是全场再次响起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老将军，想啥子事啦？快看看这个‘总体设计’行不行？”余秋里用胳膊轻轻捅捅依然沉浸在往事回忆中的何长工。

“噢噢，还是开我们的‘国家会议’吧！”老将军自感有些失态，赶紧收回自己的思绪，认真地说，“你我的牛都吹出去了，现在只有一条路：拼出老命也要把‘敌人’的大家伙找到！”

“是嘛，今天来找您就是为了松辽平原底下的那个大‘敌人’嘛！”余秋里说。

何长工一听松辽底下的“大敌人”便情绪高涨起来，忙招呼“三国”代表：“好好，大家都来先说说那边的情况。”

余秋里谦虚地请地质部的旷伏兆副部长先说。旷伏兆也是老红军，中将军衔，余的江西同乡。

旷伏兆的双眉一挑，说：“那边的形势应该说是喜人啊！我们的地质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收获也不小。自从 1955 年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普委’的同志圈定松辽地区为重点地质普查的方向后，当年 8 月，东北地质局在接到‘任务书’后就开始向松辽平原行动了，特别是韩景行带的 6 人小组，几个月后就在吉林北部和松花江沿线找到了含油页岩样品。经李四光部长和黄汲清、谢家荣等专家的研究，判定了整个松辽平原是个巨厚沉积且具有含油大构造的盆地。去年 4 月中旬，我们地质部的松辽石油普查大队 501 钻机第一个打出了油砂，继而普查大队又在几口浅井中见到了油砂，其中最著名的是南 14 孔，昆井位于吉林怀德境内的五家窝棚，从井深 300 米处开始见油砂，一直到井深 1000 多米见的变质岩裂缝中还见稠油，全井共见含油砂岩 20 余层达 60 米之厚！”

何长工笑呵呵地对余秋里说：“我就是听说这个情况后才敢在中南海向‘老毛’报告说中国有‘巴库’的。”

余秋里佩服地朝老将军笑笑，又向中科院的物理专家顾功叙询问：“老顾，你说说，物探对松辽地下油层储量前景是什么看法？”此刻的余秋里已经知道：石油勘探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可以概括为：普查先行，物探定论，钻井出油。地质部已对松辽的普查工作做得非常好了，物探能够对所普查的地质情况进行定论，那么他的石油勘探队伍就可以早日让松辽地底下的石油冒出来！

顾功叙说得非常干脆和肯定：“根据已经进行的物探工作，我又和黄汲清等专家研究认为，松辽盆地是个面积约 26 万平方公里的新生代沉积盆地，其盆地的最深部位在中西部，可深达 5000 多米以上，所划范围之内均有较好的

生油层和储油层。而且根据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所进行的工作可以初步这样结论：松辽平原上有几个构造中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现在的关键是要找到它，只是眼下我们定下的两口基准井形势有点不妙。这石油部你们是知道的。”

余秋里与康世恩交换了一下眼色，说：“老康，你说说两口基准井的情况吧。”

康世恩揉揉猩红的眼睛强打起精神。

何长工发现了，说：“康世恩你是不是昨晚又开夜车啦？”

余秋里解释：他过年这三天，一天也没休息，天天跟几个技术人员在商量基准井的事。

何长工忙向里屋叫道：“老伴，快把人家给的那盒蛋糕给端上来！”

老伴尹清平大姐一边应着一边举着一个大蛋糕进客厅。

何长工把第一块切好的蛋糕放到康世恩的手中：“快吃，不吃好睡好怎么能找出油呢？”

康世恩说：“谢谢老将军的关爱。”吃完蛋糕，康世恩顿觉精神了许多。他本想补充一下石油部在松辽一带做的先期地质工作，后来还是省去了，因为从分工而言，地质部对松辽的先期地质普查工作确实要比石油部多做不少，而且就技术力量相比，他们上有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这些大地质学家，下有朱大绶、吕华、朱夏、关士聪、王懋基这些中坚力量，更不用说像韩景行这样最先勇闯松辽平原，在蛮荒的北大荒上能找到油砂本身就是功勋卓著的表现。松辽有没有油，不仅仅是哪个部门的事，而是全中国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关注的大事。过去美国人和日本人也都在松辽一带做过地质普查工作，但结论是“松辽无油”。是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首先指出了“松辽有油”的理论方向，特别是陆相地层生油理论的产生对松辽盆地找油产生的理论影响功不可没。

关于松辽油田——就是后来的大庆油田的发现问题上，曾经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这场争议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到底谁的功劳大，恐怕没人真正能说得清，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大庆油田发现，并非靠的力学构造理论，而是大地陆相生油理论。10年前，我有幸为大庆油田发现而写过一部报告文学，这部报告文学因为涉及“一面红旗”的问题，而被当时的一名主管工业部门的副总理批评过，其实这位副总理并不真正知道大庆油田到底是以什么理论发现的，他也是出于无奈，为防止这种“陈年旧事”再起什么风波。然而围绕大庆油田发现的科学技术争论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不弄清楚，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史和石油工业史都是有害无益的。遗憾的是有人并不想

这么做。

康世恩是学地质出身的，他心里清楚，至少他清楚两件事：一是松辽油田即后来的大庆油田发现的理论依据是陆相生油理论，这个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潘钟祥教授和黄汲清先生。潘钟祥教授死得早，又没能参与大庆油田发现的具体工作，所以黄汲清和谢家荣及翁文波先生成为了主要的根据陆相理论找油的实践者和决策者。特别是他们在 1955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商定的《关于 1955 年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中，就已经点明了松辽地区作为重点石油地质普查的对象，及 1 年后由黄汲清领导、翁文波等人参加绘制的新中国第一张《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更加清楚无误地划定了松辽地区是中国未来找油的主要方向，这张《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现在只有一份保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10 年前在黄汲清临终前的几十天前我采访过他，他给我讲起此事，也明白无误地证实：“我国东部几个大油田普查工作是 1955 年初在当时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作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教授和我在 40 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和我的大地构造观点，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这一历史事实是‘普委会’广大干部、技术人员都知道的。在这之后，我又编制了《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把上述四大地区用橙红色明确圈出……”（引自黄汲清于 1978 年 1 月 11 日写给邓小平的信）。其实关于黄汲清运用大地构造理论，最早肯定我国包括松辽等平原有石油的历史记载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百年石油》一书的第 162 页有这么一段话：“从瑞士留学回来的黄汲清是我国最早涉及石油领域的地质学家之一，他在 1935 年就指出：‘据大地构造学理论，我认为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带都有可能储油。’科学理论的先导作用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也会明白，因而历史和后来的实践都证明了松辽（即大庆）油田的发现，毫无疑问是以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老一批地质学家的陆相生油理论有着不可否认的直接关系。在采访黄汲清的同年，我又有幸采访了石油部的翁文波先生，在提及发现大庆油田的理论贡献时，翁文波先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陆相生油理论确实决定和指导了大庆油田的发现工作。

黄汲清和翁文波是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地质学家，他们俩人关系之好，除了共同的事业追求外，还有一层非常深的特殊关系：黄汲清的恩师之一是翁文波的堂兄翁文灏，而翁文波在 1936 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时，在面

临下一步学做什么时，得到过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代所长的黄汲清的建议，黄说你既然学了物理专业，就应该使自己拥有世界水平的知识，到国外去学物探专业，中国地质事业前景很大，可物探的人才很少。翁文波后来真的考上了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地球物理探矿专业，并且从此走上了报效祖国的物探事业。黄汲清和这位“老弟”在解放前的玉门油田发现中就并肩战斗过。新中国成立后，黄汲清最早身兼两个职务：既是地质部石油地质局的总工程师，又是康世恩领导的国家石油勘探管理局主要技术负责人。翁文波呢，是石油部勘探司的总工程师。黄汲清亲口告诉我：如果不是因为当时自己被定为是“右派”倾向分子，政治命运捏在别人手里，又因中国地质科学院硬拉他去任职，他或许就是余秋里和康世恩手下的人了！

说到黄汲清和翁文波对松辽地质理论的贡献，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还有两个人必须着重提一下，因为他们对中国石油的贡献和最后的命运反差极大。第一个是石油部第一任总地质师陈贵，这位为发现和开发玉门油田作过特殊贡献、在新中国多处油田洒过热血的杰出地质学家，正当他雄心勃勃为松辽油田准备大干一番时，却被打成了右派，随后下放到青海石油管理局监督劳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再度受冲击的陈贵不羞羞辱，含冤于当年6月12日自尽于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另一位大地质学家谢家荣几乎与陈贵的命运如出一辙，他是地质部的总工程师，也是在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也是在“文革”开始时便不堪折磨而以最古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谢大师的妻子在丈夫离世不几天也以同样的方式告别了人世……

关于松辽前期发现的贡献，有许多不同说法的“版本”，但这些千差万别的“版本”中在一个问题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即：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三方科学技术人员的功绩各有所长，谁也不能抹杀。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会儿“三国”之间关系密切，不分你我，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共和国建设尽快找出大油田，这才是他们真正想的事。“其他的事想都没想过，也那没个闲心想。”一位老石油人对我说。

2004年5月的一天，我在大庆文联李学恒先生的引领下，来到大庆石油管理局的一个职工宿舍，见到了坐在床头的杨继良老先生。杨是国家正式确定对“大庆油田发现”上作出杰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中石油部方面名列第二的人。大庆油田发现初期，杨继良还是个刚结婚的小伙子。40多年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连话都不能说了——他在半年前患了中风。再看看这位为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的家，我心里非常难过：老两口住着也就几十平米的旧房子，没有任何装修，瘦小的老伴——也是当年大庆找油的女地质队员，每天靠发气功给丈夫治病——看着老太太那么瘦小，我真怀疑她能不能发功起作用，

但她很自信，说一定能给杨继良治好。想当年，这对小夫妻的孩子才8个月，为了早日找到油田，他们把孩子放在天津的亲戚家，俩人便来到会战第一线，而且一直分居了两年多，那时会战前线没有房子可供家属们住，见一次面也只有在指挥部开会时偶尔有那么一点机会，同时又像干地下工作似的找个地方亲热片刻。艰苦的岁月里他们就是这样度过的。而今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能够日夜厮守在一起，但老夫妻俩却过得如此清贫和艰难。

我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是，那天杨继良老先生一听说我请他谈大庆油田发现的事后，竟然大口喘息着，一字一顿清楚地说道：“大、庆、油、田、发、现，是、大、家、的、功、劳……”

面对这样的功臣，面对这样的功臣说的话和他眼下身处的境况，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在今天的大庆，我们除了可以到处看到“铁人”王进喜的形象和“铁人纪念馆”、“铁人广场”、“铁人村”等有形物体外，我们真的极少看得到当年那些为共和国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的任何痕迹。不能不令人感慨不已。

我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大庆的城市改建工程中，因为施工需要，得把当年余秋里在指挥会战时住的那个牛棚拆了。可有人建议这是“文物”得保留下来。事情传到余秋里那儿，余秋里立即指示：不要留了，大庆有“铁人”作纪念就够了！

这就是共和国功臣们另一面的伟大和崇高之处。看看时下某些领导干部，事情还没做出个样儿，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形象工程”倒是比比皆是。与老一辈革命家相比，我为今天的某些人汗颜。

我们还是把目光收回何长工家的“国家会议”上吧。

余秋里看着康世恩狼吞虎咽地吃着尹大姐给的蛋糕，便把自己手中的那块也给了他，又风趣地对何长工说：“老将军啊，还是你这儿丰衣足食嘛！”

何长工笑着说：“现在你们石油部是饿了一点，不过等找到大油田了，你可别忘了给我们地质部一口饭吃啊！”

余秋里来劲了，站起身，嗓门大大的：“老将军你记住，只要咱们石油部钻出了‘哗哗’流的大油田，我第一个请你吃红烧肉！”

何长工瞪大眼：“噢，搞了半天你们余秋里这么小气？就给一顿红肉烧来打发我这个老头子啊！”

余秋里立即改口道：“哪是一顿嘛！你老将军什么时候想吃，我就在石油部大门口恭候！不不，我让康世恩同志他们亲自来接您和尹大姐到我们那儿去！”

话音一落，惹得满堂宾客哈哈大笑。

“红烧肉”在60年代之前的中国宴席上都是一种最好的菜肴，尤其是在南

方。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毛泽东和他的那些大半是南方人出身的共和国元勋们也都爱吃红烧肉。奖励一顿红烧肉是他们这一代人之间的一句口头禅。余秋里也不例外，且终身爱吃红烧肉。

然而，松辽找油问题上的这块“红烧肉”并不那么容易吃到。地质学家们已经通过自己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松辽平原存在石油资源，但再伟大的理论也只是纸上谈兵，见不到油等于是零。

余秋里和石油部的人要实现的就是把“大敌人”逮到手，把真正的“红烧肉”夹进嘴里。这不是一般的功夫。需要倾情倾力，甚至耗费举国之力。

金门前线的炮火自第一天开始后，美国和台湾岛上的“老蒋”急红了眼，美国人调来了航空母舰，“老蒋”也四处招兵买马准备跟毛泽东再次决一死战。指挥我人民解放军和前线国防的彭德怀元帅其实此刻心头也十分着急，其中原因之一是，从全国各地调运的军队和战车每天都要吃掉几百吨几千吨的油。为此，陈云副总理口袋里的外汇连连吃紧，因此中央把迫切的目光放在余秋里和石油部的身上。余秋里对这些情况比石油部的任何人都清楚，压力因而也大得多。没有压力，要你余秋里石油部干啥？不是重要的岗位，不是泰山一样的重任，彭老总舍得把自己的爱将从部队抽到地方上去搞工业？这哪是简单的搞工业嘛！石油既是国民经济的“血液”，也是现代军队的“血液”。彭老总清楚着呢！

余秋里也清楚着呢！

油在何处？茫茫北大荒，浩浩松辽地。地质学家在中国雄鸡形的地图上潇洒地用红笔一圈，扛三脚架的地质战士和扛钻机的石油工人们则不知要跑断多少条腿、流尽多少汗水才能寻到一片沉积岩、一块油砂石啊！

还在玉门和克拉玛依调查研究时，余秋里听了几件事感动得几度拭泪：

事情发生在这一年的8月18日，正在依奇克里野外进行区调的113地质队女队长戴健，正带着两名队友越过依克里克沟，向另一座荒山挺进。戴健一路前进一路用地质锤敲敲打打，观察地貌，采集标本。中午时分，天空突然变色，随即暴雨倾盆。三位姑娘赶忙收拾已获的地质资料和标本，贴着如削的岩壁寻求躲身之地。在她们的脚下，一股汹涌的洪水已经形成。不知是谁挎在肩上的标本包坠入水中，说时迟那时快，戴健正欲俯身去抓，这时“哗啦——”一浪劈头撞来，将手拉手的三人打散。第一个从漩涡里冒出来的小张，幸运地抱住一块石头而幸免于难。一个多小时过去后，暴雨渐停。坐在石头上的小张高喊着队长戴健和另一个队友的名字。戴健和队友没有回音，小张忽然嗅得一股浓浓的石油芳香，再朝洪水退去的沟谷看去，只见众多油砂散落在她四周。小张兴奋不已，她以为是队长她们给她留下的成果，又直着嗓子一遍又一遍地

喊着“队长——戴队长——”，然而空旷的山谷除了几阵回声外，没有人应答她。“队长，队长你在哪儿呀？”小张哭了，哭得天憾地恸。但她没能将戴健队长和另一位女队友挽回。第二天，邻近工作的施工队闻讯赶来，几十个人排成队，拉网似的将依奇里克沟寻遍，最后在沟谷下游十几公里处，发现了戴健的尸体，那情景惨不忍睹：姑娘原本的一头秀发被乱石全部剥去，两条小腿也被尖利的碎石划得皮开肉绽，露出白骨……后来在不远处又找到了另一位姑娘一丝不挂的尸体……队友们无法忍受这样的惨景，他们脱下自己的衣服，把戴健和另一位名叫李月人的女石油地质队员包裹好后用沟谷的乱石垒成两座坟茔，然后点上火，随后全体同志默默地静坐在戴健和李月人的坟墓旁，整整守灵了两天。数天后，戴健所在大队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戴健的悼词全部内容是她在武汉大学当教授的父亲得知女儿牺牲后写来的一封长信。戴教授在信中说：莫道芳龄几何，花蕾初绽早谢。小女忠骨埋边陲，遥望西北老泪流。白发父母送青丝，健儿天国行，多珍重……

9月25日，在另一个地区进行野外调查的117队则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吞没了，女队长杨拯陆和实习生小张刚刚完成一条测线，在一座无名山上被气温骤降到零下40摄氏度的强冷空气活活地冻死了……队长杨拯陆这年还不足22周岁，她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女儿，也是杨虎城将军最小的“掌上明珠”。那年杨将军惨遭蒋介石暗害时，拯陆正好随两个姐姐到了西安才幸免一死。1955年，拯陆听了在玉门油田当管理局副局长的哥哥的话，从西北大学毕业后自愿分配到新疆地质调查队工作。不愧将门之女，拯陆年纪轻轻就被委以队长之职。她工作努力，从不叫苦，人们还以为她是个出身贫苦人家的儿女。队友们后来在拯陆牺牲的地方发现了那个地区的第一个石油地质构造，就命名为“拯陆背斜”地质构造。

余秋里拿着戴健和杨拯陆两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的遗照，双手发颤着连声喃喃着：“娃儿可惜，娃儿可惜啊！”

娃儿们却在照片上含着笑对她们的部长说：我们不感到可惜，我们感到光荣和自豪，因为我们是唱着《地质队员之歌》和《克拉玛依之歌》而去战斗的。

“同学们，《地质队员之歌》是怎么唱的，我很想听听！”一年前的中南海。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以难得一见的激昂，这样高声问着一屋子围聚在他身边的地质学院的毕业生们。他们明天将奔赴祖国各地的找油和找矿战场上去。

于是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高唱起来：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

“好，这歌非常好。同学们，你们说，地质勘探工作是个什么工作啊？”刘少奇点上一支烟，举目试问身边的年轻人。

年轻人于是争先恐后地回答。有的说：地质勘探就是千里眼，一眼能看到地底下的矿藏；有的说地质勘探就是先行官，祖国建设我们走在最前沿。

刘少奇笑笑，猛吸了一口烟，然后习惯地踱起步来：“地质勘探嘛——我打个比喻吧！就像我们过去打游击，扛着枪，钻山洞，穿森林，长年在野外，吃饭、穿衣……都是很大困难。今天的地质勘探工作和这差不多，也要跋山涉水，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吃很多很多的苦……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呢？”

没有回音，只有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目光和沙沙作响的记笔记声。

“过去，我们那一代人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吃苦，为的是打出一个新中国。今天，你们去吃苦，是为了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奇同志拍了拍坐在一边的老将军何长工，把声音提高了一倍，“打游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们知道这位老将军的腿是怎么跛的吗？就是打游击留下的残疾！现在轮到你们打游击去了，你们怕吗？怕苦吗？怕献出生命吗？”

“不怕！——”同学们齐声回答。

“对，不要怕嘛！因为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

这是多么幸福与难忘的时刻。在我采访的那些当年在余秋里领导下参加过大庆油田会战的老一代石油勘探队员中，他们许多人就是因为被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们的教导关怀下，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艰苦的石油事业。

余秋里在拿着上面两张英勇牺牲的年轻女队长的照片的同时，他还知道另外两名石油勘探地质队的男队员确实是带着猎枪出发上野外的，可他们没有回来——那是 115 队的一个送水的骆驼队的队员，年仅 18 岁。那天晚上暴风刮来，十余峰骆驼跑了，这位队员就带上猎枪立即顺着骆驼留下的新鲜脚印去追踪。可两天后队上的同志们仍没等到他回来。队长急了，发动全队人到处寻找，最后在距队部 200 多公里的山岭边发现了骆驼群，而同时也在距骆驼群 50 多公里的一个黄色土堆前发现了这位小队员的尸体——那儿无水无草更无人，只有一望无际的荒漠。那小队员的胸前布满了他自己的指痕，那是他口渴、胸闷难忍而留下的伤痕。队友们见此景，一拥而上地抱住其尸体，个个号啕大哭……与 115 队相邻的另一个地质勘探队的一名男队员却因出去为同志们拉水而一去未归。队友们找遍了整个大盐滩，除找到一点点遗物外连遗体都未

见……

松辽找油战斗比这要惨烈得多！我从好几个人那儿知道，余秋里曾经做过这样的心理准备：松辽找油大战中或许要牺牲几千人……

现在不是谈论牺牲多少人的问题，而是油在哪儿的问题。

油，能在哪儿呢？

余秋里已有些日子在为松辽的找油前景焦虑不安了。自他上任石油部长后，部里已经向松辽平原派去了一支又一支队伍。康世恩从地质业务的角度告诉他：要想在一个不见油砂露头、不见明显地质构造，又不见任何前人留下原始资料的“三无”地区逮住“地下大敌人”，就必须不断加强那儿的普查和勘探队伍。余秋里是谁？什么仗没打过？在用兵问题上，他有娴熟的指挥艺术。

那个后来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作出特殊贡献的西安地质调查处的杨继良，被抽调往松辽石油勘探处途中，石油部机关有人托他带一枚“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处”的图章，说是那边宋世宽他们正等着用章“开张”工作呢！在长春见到宋世宽后，杨继良兴冲冲地说：“呃，宋处长，我把章给你带来了。”

“哈哈哈，杨地质师，你的那枚已经要进历史博物馆啦！”宋世宽朝新来报到的杨继良直乐。杨继良被笑得双眼发愣：“咋，你们连公章都可以不要啦？”

“余部长已经把我们松辽石油勘探处提升为松辽石油勘探局啦，他宋处长现在是宋局长啦！”有人告诉杨继良。

“这、这不到一个星期时间就、就……”

“小杨同志，余部长等部里领导每天都在等着我们松辽这边的找油进展，如今松辽大地上的石油勘探一天一个变化。你一年前要是到这儿来，我们石油部的地质勘探人员加起来也就几十来个人，现在已经有 1000 多人了，余部长他们还在不断往这儿派人哪！这说明啥？说明我们松辽方面能不能早日找到油，成为北京方面天天都在盼望的大事啊！年轻人，甩开膀子痛痛快快干吧！”宋世宽一番话，说得初来乍到的杨继良热血沸腾。

杨继良在这之前没有见过部长余秋里，他区区小地质队员，自然不知身经百战的将军是如何指挥一个又一个大战役的。

余秋里那个时候当然更不知道杨继良是何人。而他关心的是如何迅速打开松辽找油局面。过去外国人一直说中国“贫油”，后来地质学家们——包括苏联大专家们都曾说“东北有油”、“松辽前景可观”，再后来地质部何长工他们先是送来韩景行他们野外采集到的油砂，再后来是“南 17 孔”的岩心含油喜讯，而石油部自己的队伍也相继获得一份份“松辽有油显示”报告，可油到底在哪儿？余秋里要的不是两军对峙前那些侦察员向他报告的有关敌方的捕风捉影的虚玩意儿。